

DOI: 10.3979/1673-8268.20230425001

引用格式: 于学强,王慧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 25-32.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于学强,王慧芳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从中共一大党纲首提“监督”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发展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基于对形势的认知分析、政党的自我定位和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影响,党内监督制度带有一定的零散性,在呈现单一化、任务型与集中性特点的同时,也约略呈现体系化发展态势。此时期党内监督格外关注纪律建设以保证党的统一性,同时强调发扬自我批评精神和实行党内民主监督,在上下级党组织方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在党组织与普通党员方面,强调党组织对党员的规约性;在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方面,强调党组织监督的重要性和相关程序。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开启了相关制度建构之先河,配合了党的历史任务并推动了革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党内监督必须着眼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其次,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贯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接;最后,党内监督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实现监督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党的建设;自我革命;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268(2025) 01-0025-08

从中共一大党纲首提“监督”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发展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由于党内制度建设还不系统、不成熟,并没有引起学界较多关注。从现有学术资源来看,多数学者

^{*} 收稿日期: 2023-04-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及其运行研究(21BDJ012);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 党内巡视百年历程、嬗变机理与基本经验(21BDCJ01);山东省研究生优质课程“中共党史专题”(SDYKC19060)

作者简介: 于学强,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与实践研究,E-mail: yuxueqiang@lcc.edu.cn。

将早期党内监督研究聚焦于中共五大党章首次提出设立“监察委员会”之后^①。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发展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能因为早期关于党内监督制度的探索还不成熟而不去研探。相反,为了系统梳理党内监督史和指导当下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更应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样态与原因,研究当时党内监督制度的运行情况及突出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客观评价与时代反思。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样态及原因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的发展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制度依托密切相关。无论是人的认识水平还是制度建设水平,都受制于时代形势和历史发展。正如《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结合当时实际所指出的,“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1]33}。客观地讲,鸦片战争后外敌入侵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人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和组织力”的状况,在中国被裹挟进入现代化进程时有所改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这种“政治上的感觉力和组织力”又得到渐次发展。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建构还未真正起步。但是,这一时期,我们党也萌发了监督意识并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意识动因和思想基础。一方面,由于党员人数和党组织规模较小,党的工作也相对简单,围绕具体工作出台的党内监督制度带有一定的零散性,并呈现单一化、任务型与集中性特点;另一方面,基于工作的连贯性与联系性,零散制度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并约略呈现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化发展态势(毋庸置疑,这种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化发展态势只是契合了当时制度不断走向成熟的指向,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党内监督制度的体系化)。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已明确党内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纪律”单列一章,开始构建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体系,规定所在地建立党组织的党员必须直接接受中央委员会之指挥监督;中共三大明确党员在开展活动时,必须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强调将党员、党组织活动置于党的统一监督之下。概括而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呈现如此样态的原因如下。

首先,对形势的认知分析。“我们的事业在起手的时候,一定要遇着非常之多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这个阶级的知识缺乏,是最大的困难。”^{[1]561}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将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分析社会问题作为“最重要的任务”^[2]。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伊始便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和自身发展的迫切性。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认识,使党对自身快速发展与提升的希望愈发急切,中国共产党早期发生的各类“左”倾错误几乎无一例外地与这种渴求发展的迫切性相关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一方面出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知,强调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并时刻警惕其他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的影响,通过排斥与不接触的政策要求来保持自身的纯洁性,而这方面要求也成为当时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当然,由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还很有限,当时在组织监督方面主要“聚焦于党的领导机关,将地方委员会作为重点监督对象”^[3]。毫无疑问,之所以如此也受到了列宁将党的监督与领导结合使用,甚至将监督作为领导的手段使用的影响。如列宁强调参加非党组织的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4]。另一方

^① 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内监督制度探索本身比较零散,学者们大多将其嵌入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总体发展进程的研究中,且整体论及内容比较薄弱。涉及这一时期的主要文献及观点为:黄晓辉的《党内监督工作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与新发展》(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认为,中共五大是党内监督由模仿苏共向独自探索的重要转折;何旗的《党内监督的百年探索:历史演进及价值启迪》(载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认为,中共五大开启了党内专门监督机构的历史篇章;范瑞光、赵军锋的《调适性嬗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变迁的逻辑理路与前瞻思考——一个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认为,中共五大及而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发展变革反映和体现了党内监督权的调适整合;等等。

面,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的分析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马克思主义无疑为党内监督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导,但因早期党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许多问题自己(指陈公博,中共早期党员,广东党组织发起人之一,后背叛革命)固然不能解答,闲常问起仲甫(指陈独秀,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也不能解答”^[5]。所以,当时我们党并没有准确把握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以及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目标之不易,没有认识到阶段性目标及其实现中的联合力量,造成树敌过多,对自身纯洁性的建设要求过于理想化。

其次,政党的自我定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定位和认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偏好。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通过日本、苏俄及英法等国的传入,相关译著和二手文献,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们党在理论认识上的偏差,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党对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认识,导致其在自身建设方面高度重视长远与终极目标,对自身纯洁性的要求也较高。二是对其他阶级阶层的排斥。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国内各阶级状况的判断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对除工人阶级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保持高度警惕,这也影响了一大期间党对国情的整体判断,提出所谓“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3},而此时中国的资产阶级也在为改变自身处境与革命形势而努力。三是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处于体制之外的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主要面临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一切革命运动都必然围绕解决这两对主要矛盾进行。在当时的体制之下,所有致力于解决这种矛盾的主体都受到体制的排斥,而中国共产党还处于体制之外,只能采取秘密和“非法”的活动,这也是党格外重视纪律建设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影响。作为各国共产党的总部,共产国际的制度建设倾向与俄共(布)自身建设情况,对中国共产党影响甚大。比如,共产国际要求“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要承认必须同改良主义和‘中派’政策完全彻底地决裂”^{[6]252};“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6]254}。就出场逻辑而言,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领导原则和组织原则,领导和组织落实到监督方面自然就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向度。正是这种要求,使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纯洁性建设,注重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当然,共产国际与俄共(布)的影响既有客观的一面,也有主观的一面,并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榜样示范。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开始的建党样本就是俄共(布),而且最为了解的共产党也是俄共(布)。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宣介,以及党在幼年时期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准备不足,我们党在自身建设方面无形中将俄共(布)作为样板,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俄共(布)为参照。正如刘少奇指出的“中国党的建设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胜利,有了活的榜样以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照着列宁的原则去进行建设。”^{[7]185}二是政策指示。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明确了“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1]586-587}等内容。这些规定对三大之后党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向作用,使我们党更加注重工农联盟和土地革命问题,并于党的四大正式提出了革命领导权问题。这种压担子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同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基于贯彻落实共产国际政策指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也需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便给共产国际报告工作,详细汇报中国共产党的“现在状况”与“将来计划”^{[1]47-55}。三是人员派遣。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这种帮助除了予以中共经费支持和政策引导之外,派遣有工作经验的人员也是惯用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共产国际派遣来华的人员很多,比较有名的有马林、尼克尔斯基、越飞、加伦、鲍罗廷等,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建设作了大量工作。所以,“这一时期,党

的组织设置还仅仅停留在对苏共党的单纯借鉴的基础之上,对党的组织与个人的监督与制约较为笼统地体现为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党的组织对个人的要求与约束”^[8]。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的运行情况及特点

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甫一诞生便意识到自身的特殊性,特别强调加强纯洁性建设,不仅在党的纲领中指明必须断绝与其他阶级和党派的关系以保持自身的“纯粹”,还要求党员在加入党组织之前,必须与党的纲领和主旨相背离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13],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推进党内监督发展的重要内源性动力。中共一大规定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以及党员候补期制度等,既是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也为党内监督的开展提供了初步的制度依据和法理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内监督,基于恶劣政治环境下开展党的活动的不易,以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相关论述的理论指导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这一时期的党内监督格外关注纪律建设以保证党的统一性。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纪律监督”^[9],其制度体系运行状况及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上下级党组织方面,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基于党的性质及所处环境,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十分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强调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必须注重中央集权原则,只有坚持集中统一原则和铁的纪律要求,才能使中央具有“不可抗辩的威权”^[170]。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指明了统一组织和严格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党员“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14],地方委员会“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4]。192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强调接受中央指挥和监督的重要性,要求一个地方凡有三至五名党员即应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若小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193-94];若区执行委员会亦未成立,“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194]。“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大会的各种决议,审议及决定本党政策及一切进行方法;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并在其范围及权限以内审议及决定一切进行方法。”^[195]在第三章“会议”部分,章程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派员到各处召集各种形式的临时会议,此项会议应以中央特派员为主席”^[196],以强化对下级的指导;在第四章“纪律”部分,章程同样强调下级服从上级,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下级的政策不得与上级政策相冲突,以及地方开除党员必须实行向上汇报的制度。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款更是将规定具体到财务领域,要求会计管理党的财政行政必须“在中央督察之下”^[156]。

其次,在党组织与普通党员方面,强调党组织对党员的规约性。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特别强调党组织的整体性,注重从组织整体的视角推进党内监督以确保党的组织力与战斗力,尤其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监督来体现党中央权威,通过对党员的有效监管实现党组织在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彰显我们党强大的组织优势。党的第一个纲领即明确提出“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党员人数多时,可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严格监督。”^[14]不仅如此,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还对党组织监督党员的具体工作作出规定,强调“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6]在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专列了“纪律”一章,强调对地方党组织及党员个人的监督管理,明确了开除党员的六种情形。若党员在组织活动中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和义务,经组织程序可对其予以处置,甚至开除出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纪要》中对开除郭平伯等六人党籍的相关记录,即是中国共产党严格贯彻执行党章中规定的开除党员向上汇报制度的鲜明例证。与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相比,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地阐释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0]81}。正是遵循这一原则,在1922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西湖会议)上,虽然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马林的建议,不赞成中共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

国民党,但还是按照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

最后,在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方面,强调党组织监督的重要性和相关程序。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特别强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和党的利益。为了尽快健全中央组织机构和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根据中央意见,陈独秀辞去当时在国民党广东政府内所任职务,并于1921年9月返回上海^{[10]72}。1922年5月,陈独秀撰文指出,共产党人在劳动运动中的态度是联合其他政党和党派并在联合中承担两大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11]中共二大之后,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并初步改变拒斥其他力量的看法,但始终强调“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中国共产党占第一位”^{[1]63}。鉴于国民革命发展态势以及国共合作的现实情况,中共三大特别强调“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1]147},并要求“共产党党员及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中言语行动都须团结一致”^{[1]147}。1923年,《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凡党员之行动带有政治意义者,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严重监督指导之权。党员遇有不得已须在政界谋生活时,必须请求中央审查决定。”^{[1]152}在此之前,《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已经对中共籍议员的监督处置作出规定“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销其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1]75}这一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的监督,则主要集中于“财务、活动和政策”^{[1]4}等方面。

另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也是党的缔造者,他们的自身素养比较高,在党内监督方面特别强调发扬自觉性和自我批评精神,注重实行党内民主监督。在党的三大政治报告中,陈独秀便作了自我批评。他认为自己对时局看法不清且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1922年李大钊曾对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表示赞赏,而《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发布后,李大钊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坚决与改良主义倾向划清界限并旗帜鲜明地加以批判^[12]。除自我批评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我们党也特别注重在党内监督中运用批评的武器。如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既作了自我检讨,也对党的工作和有的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地方执行委员会对于区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判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抗议时,得提出全国大会或临时大会判决;但在未判决期间均仍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1]96}这既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纪律刚性,也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在监督制度建构方面“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贯通。

三、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评判

学史使人明智。“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13]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史,就是一部党的理论发展史和实践探索史。作为高度重视自身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既为之后党内监督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方法论指导,更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客观评判这一时期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开启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先河。从政党自身建设的视角看,一个政党必然有自我形塑的制度规定,而党内监督制度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变迁规律看,制度发展的总趋向一般都是从单一走向复合、从零散走向系统的现实过程。所以,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监督制度便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和斗争实践的发展,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也不断发展完善。针对革命时期恶劣的外部环境,以及诞生伊始在党员数量与政党能力方面

的弱势地位,中国共产党必须注重党内监督以凝聚和联合革命力量,采取公开与秘密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推进自身发展和革命运动。辩证地看,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既有积极作用,也存在明显不足。在积极作用方面:一是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遵循。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使党组织和党员受到了基本章法的规约,加强了自律和自我管制,凸显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的组织推动色彩和党员自觉意识,有效遏制和严肃处置了党员的违规违纪行为,保证了党的组织力量,为党在恶劣环境下生存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1922年6月,陈公博违背关于同粤系军阀陈炯明划清界限的指示精神公然对抗中央,就受到留党察看的严厉处分并最终被开除党籍。二是明确了党内监督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早在1921年3月由陈独秀草拟的第一个党章草案中,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采用中央集权制原则而非分权原则。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这一提议不仅符合实际而且得到了广泛认同,确保了党在集中统一领导下的战略安全。此后,中央集权制原则即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领导原则和组织原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重要标志。在缺陷与不足方面:一是党内监督的理论准备不够充分。中国共产党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孕生于中华大地的,但客观而言,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党内监督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亦是如此。二是党内监督的实践手段不够强大。在监督主体方面,既缺乏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设计,也无常态化、固定化的专职监督人员,普通党员的监督权利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监督手段和方式方面,虽创造性地构造了巡视等制度,但还不够成熟和系统;在监督依据与成效方面,虽然这一时期有了党纲党章,有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性要求,但如何在政治实践中落实这些原则与要求仍有待探索,而且实践的复杂性往往也很难使制度体系在不完善的条件下完全转化为治理效能。

其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配合了党的历史任务并推动了革命发展。革别人命易,革自己命难。政党的自我认知能力是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衡量指标,也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改造社会的前提在于进行自我改造,党内监督本质上是党的自我监督和自我革命,唯有如此才能推进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既推动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不断走向成熟,又不断深化党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中国国情尚缺乏深刻认知,甚至认为中国是“资本家的国家”^{[1]548},提出以革命军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1]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党的二大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明了党领导开展社会革命首先应完成最低纲领,即“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6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进入各级议会,通过议会斗争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酝酿民主革命的高潮进而达到社会革命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特别强调对中共籍议员的要求与监管,提出“本党国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省会,市会,县会议员绝对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和区及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和指挥;一切重大政治问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以方略。”^{[1]74-75}“本党议员不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或违犯中央执行委员会方针时立即撤销其议员资格,并开除出党。”^{[1]75}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当时特别注意防范党员特别是进入议会的党员蜕变为工人贵族,特别强调通过加强党内监督及制度建设,使之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不忘初心使命,时刻不忘维护工人农民及劳动阶级的利益。直至中共三大决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后,我们党也始终强调“本党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1]515},并通过各种方式监督国民党在政治运动上的妥协倾向和在劳动运动上的改良倾向。应当讲,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这种加强党内监督及制度建设的努力,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保持了自身独立性,为日后我们党独立领导并推进社会革命创造了条件。

最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对当今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一是党内监督必须着眼于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搞好党的建设。革命年代,

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的面貌才能焕然一新并最终取得胜利,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新时代以来,虽然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没有变、初心使命没有变,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而且,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并愈益深入人心。巩固和发展这一广泛共识,必须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以强有力的党内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更好凝聚党心民心。二是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必须走法治化道路。党的建设靠制度,更要靠法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发展完善,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也取得较大进展。不断强化党内监督法规和健全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并以党内监督法治化推动党的建设,以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贯通、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对接,是新时代建党强党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短板弱项,进一步推进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法治化,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使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和法规体系更加严密、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三是党内监督必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是先天带有自我革命基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4],这种基因不仅体现在党成立初期,还贯穿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和工作的各个环节。当前,面对“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新形势,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如何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需要中国共产党拿出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决心。要通过自我革命逐步完善监督机制,创新监督方式方法,探索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监督实效,确保监督覆盖无死角;不断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是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腐败问题;积极推动监督工作常态化、制度化,确保监督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长效机制。新时代,只有坚持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为全党全国上下走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提供有力保证。

四、结 语

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形势任务的判断、社会性质的分析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特别是当时“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7]220},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中共一大主要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纯洁性视角推进党的建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晰。中共二大后,党对形势任务的分析日益明确,开始关注到长远目标与近期任务的协同,并且开始关注统一战线问题,在党内监督方面关注如何在国共合作中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并在实践中加大了对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的监督力度。中共三大在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纪律之外,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注重自我检讨,在一定意义上关注了党员监督权利的保障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内监督制度建设作为党内监督制度发展的起点,不仅开启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先河,而且配合党的历史任务在实现自我革命的同时推进了社会革命。必须指出的是,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完善制度、健全体制、理顺机制一体推进,将党的制度建设与治国理政协同考量,如此才能使制度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2] 《中国共产党简史》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5.
- [3] 杨浩,陈渤.党内监督体系的历史生成、演进特征与建设经验[J].豫章师范学院学报,2024(5):13.
- [4]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8.

- [5] 李涛.亲历者忆:建党风云[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43.
- [6]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8] 陆明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历史沿革及对现实的启示[J].学术探索,2001(S1):80.
- [9] 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169.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 [11]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51-252.
- [12] 沈建中.建党初期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历史经验[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10):32-35.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
- [14] 肖唤元.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历史进程、内在逻辑及基本经验[J].理论探索,2022(1):55.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ra-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YU Xueqiang , WANG Huif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Liaocheng University , Liaocheng 252059 ,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initial inclusion of “supervision” in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uomintang , the early days of intra-Party supervision development marked a foundational stage. During this period ,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 the Party ’ s self-positioning ,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s) , the intra-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exhibited a degree of fragmentation. While characterized by singularity , task orientation , and centralization , it also showed embryonic signs of systemic development. In this stage , intra-Party supervision focused particularly on strengthening discipline to ensure Party unity , promoting a spirit of self-criticism , and implementing intra-Party democratic supervision.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and lower-level Party organizations , emphasis was placed on the subordination of lower levels to higher levels;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ordinary members , the regulatory role of Party organizations was stressed; and between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cadres ,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ational supervision and related procedures was highligh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ra-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CPC pioneered releva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 supported the Party ’ s historical missions , and propelled revolutionary progress ,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First , intra-Party supervision must focus on consolidating and enhancing Party leadership , ens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s and policies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Second , building the intra-Party supervision system must follow the rule of law , leveraging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Party governance to promote comprehensive law-based governance , aligning intra-Party supervision with state supervision and integrating Party regulations with state laws. Finally , intra-Party supervision must embody the spirit of self-revolution , innovate approaches ,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supervision of leading cadres at all levels , thereby institutionalizing and normalizing supervision practices.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tra-Party supervision; Party construction; self-revolution;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编辑: 秦 锐)